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丛刊

《呐喊》中的散文

林 非

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
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

凌 宇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辛 宇

关于认识与划分鸳鸯蝴蝶派
的几个问题

刘扬体

1983 2

北京出版社

封面题字：萧 劳

封面设计：刘玉忠

38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三年 第二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北 京 出 版 社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2.0625印张 301,000字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200

书号：10071·475 定价：1.10 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目录

一九八三年第二辑 (总第十五辑)

作 作 研	家 品 究	《呐喊》中的散文	
		——《论鲁迅的小说创作》片断……………林 非 (1)	
		功利性与怡悦性的辩证统一	
		——论鲁迅“不用之用”的美学思想	
		……………刘正强 (19)	
		自己走出来的路子	
		——试谈沈从文小说的艺术特色……董 易 (33)	
		对于爱情和道德问题的思考	
		——评柔石的《三姐妹》及其它……………郑择魁 (53)	
		试论郑振铎的散文……………沈斯亨 (64)	
青 年 论 丛	大 学 生 论 文 专 栏	试论鲁迅作品中的浪漫主义……………丁柏铨 (86)	
		略论《子夜》的结构艺术……………骆 飞 (111)	
		茅盾与自然主义……………吕效平 武锁宁 (125)	
		“浓得化不开”	
		——论徐志摩的散文创作……………倪婷婷 (148)	
		试论孙犁小说的意境……………乔以钢 (163)	
		民主的思想 真实的形象	
		——谈《一生》、《祝福》、《为奴隶的 母亲》和《生人妻》中的劳动妇女 形象……………陆 莹 (178)	
		倔强的灵魂	
		——谈丁玲小说中几个女性形象 的塑造……………宋晓萍 (191)	

		黑暗环境中的美好灵魂 ——试论艾芜《南行记》中劳动人民形象马小林 (204)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对中国早期话剧创 作的影响.....温大勇 (215)
思 流 社	潮 派 团	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 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凌 宇 (229) 狂潮退后的歌吟 ——略论浅草社的创作倾向.....林基成 (247) 闻一多早期唯美主义述评.....刘钦伟 (259) 论“湖畔”派的诗体探索.....范亦毫 (277)
札 随 短	记 笔 评	关于《故事新编》.....唐 弢 (293)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辛 宇 (295)
争 园	鸣 地	关于认识与划分鸳鸯蝴蝶派的几个问题 ——鸳鸯蝴蝶派再探.....刘扬休 (307) ✓
资 料		从徐志摩与陈毅的关系说起.....王锦泉 (336) ✓ “左联”第四次全体大会史料考释.....程中原 (342) ✓ 关于郁达夫脱离创造社及《广州事情》...潘世圣 (350) ✓
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 在国外		论中国象征派〔苏〕Л.Е.契尔卡斯基著 理然译 (357)
读 作 编	者 者 者	来信照登.....兰州大学中文系 张 谦 (382) 编后记..... (383) 稿约..... (封三)

《呐喊》中的散文

——《论鲁迅的小说创作》片断

林 非

一

《呐喊》不仅是鲁迅首次汇编的小说结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短篇小说结集之一^①。它在现代小说创作的开拓中间，起了带路和示范的作用。正象茅盾所说的那样，“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欣然有多少人跟上去试验”（雁冰：《读〈呐喊〉》）。

正因为进行的是开拓和创新的工作，所以在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容易会出现一些不太成熟的痕迹。譬如说从小说创作的技巧来看，《呐喊》这个集子里所收的篇章，大体上不如《彷徨》显得圆熟，有些篇章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应该归入随笔、速写这一类的散文体裁。还没有将小说和散文严格地区别开来，这可以说是在新文学创作最初阶段必然会产生的一种现象。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将1921年1月

① 据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创作集”统计，最早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中，有郁达夫的《沉沦》（1921）、《茑萝集》（1923），叶绍钧的《隔膜》（1922）、《火灾》（1923），鲁迅的《呐喊》（1923），冰心的《超人》（1923），倪贻德的《玄武湖之秋》（1923）等。

到3月之间发表的小说，作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在他查阅过的七十多篇短篇小说中，就认为“其中有不少恐怕只能算是‘散文’”，这已经是在《呐喊》中一半以上的作品发表后的事情了，却还跟《呐喊》中出现的情形完全一样。

尤其是在当时发表的一些采用第一人称写法的作品，就更难以区分出是小说还是散文，象创造社作家郭沫若和郁达夫那些采用第一人称写法的作品，就发生了这种较难区分是小说还是散文的情形。在小说与散文这两种体裁之间应该是有区别的，小说往往通过严密和完整的情节结构，侧重于描摹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散文却可以在比较自由自在地叙事时，侧重于抒发自己的情怀和哲理。自然这只是大致的区分，而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在不少第一人称的作品中，这种小说和散文之间的界限确实是很不分明。

在《呐喊》中应该归入散文范畴的作品，大体上是指《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兔和猫》、《鸭的喜剧》和《社戏》这些篇章^①。这些篇章无疑是应该作为散文创作来对待，才更为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的。把这些篇章作为散文而不是作为小说来对待，并不是为了要贬低它们，而是为了更符合于实际的情况，可以在理论上作出更为合理和科学的解释。在散文和小说这两种文学体裁之间，确实是不应该有什么高下之分，而是要充分地发挥它们各自不同的长处和作用。

《一件小事》的出现，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所赞扬的一个人力车夫，尽管还不是近代的产业工人，却跟鲁

① 如果可以按照这个标准划分的话，《彷徨》中只有一篇《示众》可以归入随笔、速写这一类的散文作品。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指出《呐喊》里的有些篇章是散文而不是小说，这是很正确的。此文对这种情况表示“特别不满意”，认为是“鱼目混珠”，因为“作者是万人崇仰的人”，这恰巧是说明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却又带着开拓者往往会具有的一些不成熟的痕迹，只是成仿吾没有能够对这一点作出具体的分析了。

迅在后来写成的《社戏》一样，歌颂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一件小事》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是通过第一人称主人公所遇见的“一件小事”，充满激情地抒发了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见解，而不在于着力描写这个人力车夫的性格和命运，这个基本的特征就决定了《一件小事》应该归属于散文的体裁中去。

《一件小事》所叙述的故事确实是十分简单的，一个人力车夫完全是在无意之间，用自己的车把碰倒了过路的老妇，他挺身而出承担着帮助她的义务，搀扶这老妇往巡警分驻所走去。这一件小事使人力车夫“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至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作品里的第一人称主人公，对这个“须仰视才见”的人力车夫的“后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永远忘不掉这件“小事”，因而充满激情地写道：“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他在这里描写了劳动人民质朴的思想品质对于知识分子的启发和鼓舞，还进一步提出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问题。这就和五四初期出现的有些描写劳动人民的文学作品很不一样了。

在五四前后思想启蒙运动的同时，由于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劳工运动的影响，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中国曾派华工加入了在后来取得胜利的协约国一方，因此“劳工神圣”的口号相当普遍地流行起来，蔡元培于1918年11月在天安门庆祝欧战胜利的大会上，就作了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声称“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认为“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

“劳工神圣”的口号，在诗歌创作中也发生了影响，象刘大白的《红色的新年》（1920年《星期评论》新年号），讴歌拿锤子和锄头

的工农创造了世界，控诉他们所遭受的不公的待遇，期望俄国的十月革命“直要锤匀锄光了世间底不平不公”，号召工农们“起来”，因为“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刘半农的《铁匠》（1919年10月《新潮》第2卷第1期），也是赞美工人的创造力量的。《敲冰》（1920年4月《新青年》第7卷第5号），则更是称颂集体和团结的力量，歌唱人们在共同的劳动中取得了胜利。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不少作者在描写工农的时候，旧式的人道主义思想依旧是他们全部的出发点，刘大白和刘半农的其它很多作品，就有着这种明显的表现。这些作者并不是把广大的工农放在跟自己同样的地位上，而只是居高临下地同情和怜悯他们，更不用说认识到劳动人民比自己有着更为崇高和纯洁的品质，从而对自己作出深切的反省了。象胡适和沈尹默的《人力车夫》，就是表现这种人道主义的很突出的例子。

这两首诗都登载在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胡适的《人力车夫》，写乘客看着年岁很小的人力车夫，感到“心中惨凄”，不忍心坐他的车，车夫却直截了当地回答客人，说是“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廉价的人道主义确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客人只好“点头上车”了。沈尹默的《人力车夫》，描写乘客穿棉衣还嫌冷，车夫却“单衣已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通过这样的对比，刻画人力车夫苦难和辛劳的生活。对劳苦人民痛苦生涯的同情，自然总不能说是一件坏事，然而象这种居高临下的怜悯的心情，也不过是一种浮泛的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感情，比起鲁迅发自内心的讴歌劳动人民，并由此产生的深切反省和激励自己“勇气 and 希望”的内心历程来，就显得分外的微弱了。

鲁迅的《一件小事》，既不同于胡适和沈尹默《人力车夫》那种旧式人道主义的思想，又比刘大白的《红色的新年》，和刘半农的《铁匠》等篇章来得深沉，因此茅盾认为它虽然“没有颂扬劳工神圣

的老调子”，“却感到深厚的趣味和强烈的感动”（方璧：《鲁迅论》）。

《一件小事》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的《晨报·周年纪念增刊》上，使读者感到特别巧合的，是在这年4月6日的《晨报》第七版上，发表了舍我的《车夫》^①这篇作品，也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叙述一个老车夫已经拉不动车子了，他的儿子在后面帮他推车，父亲怕儿子又饥又寒，要他赶快回去，儿子却坚决不肯，说是趁这机会走熟了路，将来可以代替他拉车养家。这父子情深的苦难生涯，大大地感动了第一人称的主人公，他把身边剩下的四五十个铜子都掏出来给了老车夫，老车夫深深地向他致谢，称呼他“真是好人”。

第一人称的主人公对穷人的布施，自然也决不能说是坏事，而应该认为是一种善良的行为，尽管这只是一种传统的人道主义作风。这篇作品所描写的车夫父子之间的深情，也有它的动人之处，不过他们的命运并没有十分触动第一人称主人公的心弦，鲁迅的《一件小事》就和这大不一样了。最为巧合的是作品里的第一人称主人公也抓出一大把铜元，要巡警交给人力车夫，然而在给了人力车夫一大把铜元之后，他并不象《车夫》里的第一人称主人公那样，感到有点儿心安理得，再也不去思考问题了，他却从内心深处感到极大的不安，“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他在思考自己的这个举动时，感到有说不出的羞怯与惭愧，甚至严重到了有点儿害怕起来，因为他从人力车夫的这件“小事”中，深深感到了劳动者思想品质的崇高，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奖励或裁判他的行为，于是他开始“裁判”和反省自己，并且用劳动者的思想品质激励自己，因而才产生了勇气 and 希望。

① 《车夫》（舍我）列入《晨报》版面的“小说”栏中，其实也是随笔、速写一类的散文。

这种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对于自己内心的不断挖掘与剖析，就使《一件小事》远远超出了当时不少作品的思想境界，象《车夫》这样的作品自然是无法与它比拟的。在文学创作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由于在创作方法上有什么原则的不同，而是由于对社会人生和自己感情开掘与剖析的深浅不同，因而使这些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区别，在散文创作中尤其会是这样的。《一件小事》所达到的这种境界，自然不能只用“劳工神圣”这口号的影响来概括，它是鲁迅在时代思潮的推动底下，深刻地思考和开掘生活后所得到的重大的思想发现。

创造社的著名评论家成仿吾，在当时没有看出《一件小事》对于现代散文的意义和作用，认为“《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呐喊〉的评论》），这自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鲁迅在当时提出这个劳动人民的思想品质值得知识分子学习的问题，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应该说是空前的，它已经在预示着五四以后新文学创作发展的方向了。

鲁迅在此之前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和《明天》等四篇小说，“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沉痛地控诉了人民群众在封建制度的毒害底下，已经形成一种愚昧和麻木的精神痼疾，他想努力去改变这种状况，这也就是他所经常思索的“改革国民性”的问题。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启蒙主义的思想阶段，总是将封建制度所造成的人民群众的精神创伤，称为“国民性”来进行不懈的研究的。然而在《一件小事》里，鲁迅所抒写的却并不是那种令人痛心的“国民性”，而完全是另外一种使读者钦佩和神往的思想品质。他深刻地挖掘出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这种光辉品质，也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那样，在他的回忆中间，除了有象毒蛇缠住灵魂的“寂寞的悲哀”之外，也还有不少东西“可以使人欢悦”，他所接触到的劳动人民的光辉品质，毫

无疑问应该是包括在这里的重要内容。

作为讴歌劳动人民光辉品质的散文作品，《一件小事》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确实有着非凡的意义。在“文学革命”运动的初期，曾出现过冰心和周作人这两个很有影响的散文作者，然而他们那些作品的思想意义跟《一件小事》却是很不相同的。冰心的散文创作除了在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建立白话文学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之外，它的思想意义也是不应该低估的。冰心所歌颂的母爱、儿童与大自然的美，都包含着冲击封建主义虚伪、冷酷和野蛮的精神禁锢，以及争取个性解放的思想因素，这在五四初期的启蒙运动中无疑是具有进步的作用。不过她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毕竟是比较荏弱和纤细的，缺乏那种“思想革命”的激昂和蓬勃的气氛，以及广阔和深刻的境界，譬如说这些作品就不及《一件小事》的思想深度。《一件小事》比起冰心散文的那种“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诗的女神》），完全是另一种宏大和深沉的气魄。

周作人很早就提倡过小品文，他自己也是以撰写小品文著名的作家，他的小品文以自然冲淡和苍劲老成的独特风格著称，赢得了不少的读者，但是他的作品的思想倾向，是远不如自己杂文的战斗性的，他向来反对传统的“载道”，而主张要“言志”，在这方面却还不如冰心散文的思想倾向来得先进。他往往沉溺于静穆和玄妙的隐逸气味中间，写出的大都是苦涩和古雅的篇章。在鲁迅发表《一件小事》的时候，周作人还没有写出什么象样的小品文来，象《苦雨》、《喝茶》那样被人称道的小品文，大都是在1924年以后发表的，他发表于1921年的《山中杂信》，还算是多少有些艺术性的小品文，这篇作品从细微的琐事中，也抒发了对于社会世态的感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不过跟《一件小事》这样的思想境界自然也是无法比较的。

二

从深沉的思索这个角度来说，《头发的故事》也是一篇值得注意的随笔。这篇作品通过两个追求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对话，对于市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冷落状况，发表了一通愤激的议论，感叹着封建传统思想的顽固存在和实行改革的艰难步履。

《头发的故事》首先说到的是“国民”的“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这也就是清醒地认识到群众没有跟辛亥革命发生多大的关系，这场革命也没有跟群众发生多大的关系。鲁迅在这里描写了群众的愚昧与落后，造成他们与辛亥革命之间的遥远的距离，因此在这场革命中牺牲了生命的烈士，也就是“不堪纪念”的了。这种思想观点在他的短篇小说《药》里曾有所表现，在他后来写的杂文《即小见大》、《这个与那个》中也有所表现。这可以说是鲁迅在当时比较一贯的认识，这种对于群众的认识虽然还不够全面，却不能不说是很大程度上符合于历史的真实情况，而且深刻得简直有些令人战栗。

其次说到的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汉族的人们曾为了这条辫子吃尽毫无价值的苦头，甚至有不少人因而受难和被杀戮的。N先生还讲了自己留学日本时因为剪去辫子，被停止官费遣送回国的往事，他为了谋生只好买条假辫戴在头上，这在当时要冒被杀头的危险，有个本家就准备去告官的，只是因为害怕革命会成功才中止了。

N先生对于辫子的痛苦的感受，自然也包括了鲁迅自己的体验，他在这方面有着极为深沉的痛苦的感触，直到他晚年时写的《病后杂谈之余》，还叙述了和N先生大同小异的经历，对于清王朝统治中国之后为了辫子而流血的历史，是常常萦绕于怀，无比愤懑的。与《病后杂谈之余》同年写成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

三事》，又表达了对于辫子的“憎恨”和“愤怒”。至于大约在《头发的故事》一个多月之前写成的短篇小说《风波》，也描写的是一场辫子的纠纷，鲁迅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写出了封建统治阶级已经处于土崩瓦解之势，因此在这场纠纷中才消失了血迹，抹去了眼泪，显出了一些轻松喜剧的意味。然而在这场轻松的喜剧中，又蕴含着辛亥革命的悲剧，原来它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只是剪去了头上的一条辫子，而当封建势力复辟的时候，剪去的辫子又给人们造成惊慌和不安，这不是一场很沉痛的悲剧吗？

《头发的故事》中的 N 先生，在后来索性废去假辫，穿着西装走上街去，于是被路人骂成“假洋鬼子”。这样的“假洋鬼子”，跟鲁迅在不久以后写成的《阿 Q 正传》中投机革命的“假洋鬼子”，自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N 先生因为被骂得太厉害了，只好穿上大衫，用手杖拼命地去打人，这才平息了人们的笑骂。N 先生对于有些日本人在中国用手杖打人是十分气愤的，自己却又不得不重演这样的事情，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发生这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不少群众在封建制度的羁绊底下，已经变得很愚昧和麻木了，任何一种哪怕是十分微小的改革，都很难得到他们的响应，甚至还会受到他们的讥笑和嘲弄，受到他们的难以想象的折磨，这种痛苦有时候简直象“站在刑场旁边”一样。正是由于这屡次体验过的切身的教训，当 N 先生所在学校的中学生想要剪去辫子的时候，因为害怕他们也落入象自己这样悲惨的境遇，他竟决绝地劝阻了他们。

N 先生从自己一再受到的这种挫折的教训中，得出了一个十分消极的结论：不要去进行改革，否则就会“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他甚至更进一步主张“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否则“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历史上任何重大的改革总会遭受挫折的，发生了挫折就得出这样消极的结论，甚至鼓吹“忘却了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想，这肯定是很谬误的。不过这

是由于在揭示和思考社会的痼疾时，没有看到光明的前途究竟在哪里，因而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产生了消极的虚无主义的思想。这种由于愤激的思考所形成的谬误，比起根本不去思考却整天沉溺在无聊生活里的市侩式的安宁来，也还是要可贵得多的。如果真正是在严肃认真地揭示和思考社会人生，即使发生了谬误，也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启发人们，继续去思考和寻找应该得到的结论，而市侩式的安宁不过是永远在庸俗中自我陶醉，用这种弥漫着怯懦和卑劣的气氛，阻挡人们跨出前进和探索的步伐。因此可以说，从这种由于愤激的思考所形成的谬误中，又包含着深刻和合理的因素，这就是从反面证明了，改革必须在人民群众中间生根，改革必须讲究实际的效果，否则就会造成许多毫无所得的痛苦。如果大家都去注意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对于社会的改革不就会比较容易地实现了吗？

N先生的这句话是说得多么沉痛：“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在一个充满了保守和霉烂气味的封建古国中，改革诚然是十分艰难的，N先生这个十分清醒的现实主义思想观点，自然也包括了鲁迅自己的见解。他在后来写成的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中，又重复了这样的意思，说是“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随着民主主义革命高潮的逐渐来临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他预感到改变中国的“鞭子总要来”的，虽然他“不能确切地知道”“从那里来，怎么地来”。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还提出了“深沉的韧性的战斗”，这是异常珍贵和重要的思想。针对着十分顽固的封建古国，任何一个决心进行改革的人，都必须具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必须不屈不挠地从事“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否则他全部的意志和思想，就会被这令人恐怖的社会压垮，就会因为悲观失望而变得消沉，最

后离开改革者的行列，甚至还会更进一步地堕落下去。因此锤炼自己“深沉的韧性”是十分重要的，而充分认识到封建社会令人窒息的状况，充分认识到战斗历程的艰苦和漫长，是锤炼改革者“深沉的韧性”的重要前提。正是这种清醒和彻底的现实主义精神，使鲁迅永远不会停滞和绝望地去寻求改革，对于任何一个改革者来说，鲁迅的这种精神确实是象生命线一样重要的。

无论是《头发的故事》和《娜拉走后怎样》，都涉及到了群众的麻木、愚昧和落后的问题，鲁迅在《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和《药》这些短篇小说中，早就已经深刻地接触过这个问题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由于处在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在他们中间自然会蕴藏着不可估量的革命性，然而又由于他们长期处在保守、狭隘和落后的封建制度底下，他们就不能不受到封建主义思想的蹂躏和毒害，因此鲁迅所坚持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也就是坚持要完成思想启蒙的任务。鲁迅这种认识的坚定性与一贯性，应该说是超越了同时代不少杰出人物的思想认识的。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如果没有真正完成思想启蒙的任务，没有真正地“改变他们的精神”，那么就是在社会革命获得了胜利之后，也依旧会出现长期存在于封建主义时代的那些精神痼疾，严重地阻碍革命的进行，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倒退。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个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思想启蒙的重大作用，而只是摆正了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这两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改变社会的存在，在这个前提底下还要充分重视促进这种改变的思想启蒙的作用。

《头发的故事》是一篇随笔式的作品，然而在这里提出的关于社会改革的见解和思考，却是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至今还值得令人注意和深思。鲁迅散文的思想境界确实是很高的，它总是常常提出那个时代里重要的问题，启发读者的思考，提高读者的精

神境界。鲁迅散文的这种思想特征，甚至在象《兔和猫》这样的即兴之作中，也是有所表现的。这篇作品含有鲁迅毕生坚持的社会信念和人生哲理，它叙述院子里一对白兔所生的小兔，在被黑猫吞噬以后，第一人称的主人公^①就想替这些可爱和弱小的生命报仇，用毒药去消灭凶残的黑猫。对凶残者的报复和抗争，这是鲁迅一贯的思想。他在后来写成的《狗·猫·鼠》中，也曾抒发过这样的思想感情。这篇作品在一开始就提到了《兔和猫》，它可以说是继续发挥了《兔和猫》中的主旨，直到他晚年写成的散文《女吊》，也还赞美了复仇的鬼魂。

在鲁迅的散文里，和在他的小说里一样，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思想家的风度，这是跟鲁迅对文学艺术社会作用的认识分不开的。鲁迅明确地表示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启蒙主义”和“改良这人生”（《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是为了“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正是因为出于明确的思想目的，正是因为融合了开阔和高昂的思想，以及对于人生哲理的严峻的思考，就使他的这些篇章在现代散文创作的开拓时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思想水平，超越了同时代的散文家在这方面的表现，也为后来的跋涉者树立了榜样，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启示大家沿着这条思想道路继续前进，才有可能写出在思想感情方面经得起推敲和咀嚼的篇章。

三

鲁迅的散文除了具有深刻的哲理涵义之外，还洋溢着出自内

① 文学作品里的第一人称主人公，往往带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有的可以明确地指出这就是作者本人，有的却又并不完全是作者本人。本文讨论的五篇散文中，《兔和猫》、《社戏》这两篇，在对话中直接提出第一人称主人公是“迅儿”或“迅哥儿”，《鸭的喜剧》则标出第一人称主人公与仲密（周作人）在一起的生活情况，这就应该是属于第一种情况了。

心的激情，《一件小事》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了这一点。至于如果只是从抒情的这个角度来说，《鸭的喜剧》简直是充满了一种怀念异邦友人的真挚情怀。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对于苦难的人间怀着一种博大的同情心，总是将自己的爱倾泻给生活里的弱小者，然而他自己却常常感到一种“在沙漠上似的寂寞”，他在院子中央的小池里养了蝌蚪，后来还买来了小鸡和小鸭，这也不能安慰他寂寞的心灵。他思念自己的“俄罗斯母亲”了，于是匆匆回向赤塔。他在北归以后始终没有消息传来，只有留下的小鸭在寂寞地叫着。鲁迅正是在这样的寂寞中，满怀深情地思念着他。

《社戏》也是一篇典型的抒情作品，而且比起《鸭的喜剧》来，有着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在这篇作品的开头，叙述他观看了几场使自己“头昏脑眩”的京戏，然后用对照的笔法，回忆自己童年时在野外看过的“很好的好戏”。他着力描写了几个农村少年陪自己去邻村看戏的情景。对于一路上乡村夜景的抒写，不仅洋溢着清香的气息，竟还是一曲悠扬和宛转的音乐，远远地眺望着朦胧月色中的戏台，真象是仙境一般。正是在这种弥漫着抒情诗气氛的舞台上，他看了几折引人入胜和永远难忘的好戏。

鲁迅对于前往赵庄来回途中的风景描写，简直可以跟他后来写的散文诗《好的故事》这样的篇章媲美。当然《好的故事》叙述的是日光底下乘坐小船的印象，写得更为凝炼和浓郁，不过这两篇作品洋溢着抒情诗的气氛却是一致的，而且《社戏》里对于夜景的描写，更具有有一种清新和自然的美，鲁迅是善于创造多种多样的美的境界的。

《社戏》富有抒情诗的意味，这是连与鲁迅创作主张很不相同的创造社著名批评家成仿吾都注意到了的。从总的来说，他对《呐喊》的评价是远远偏低了的，可是他在《〈呐喊〉的评论》中却明确地称赞“《社戏》饶有诗意”，这是因为《社戏》的抒情的特点，跟创